

看世界

国际足联融资风波引发暗战

足球世界杯也有自己的“世界杯”，国际足联融资风波，因为这件事，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7月底，国际足联抛出一项融资计划：成立一家子公司，全权负责世界杯等国际赛事的运营工作，并向私人投资者出让该公司约20%的股权。按照国际足联测算，这家子公司估值高达200亿美元，股权出让可募集资金超40亿美元。

为争取支持，国际足联为这项计划描绘了美好的发展蓝图：引入外部资本后，全球足球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将扩容至100亿美元以上。届时，各会员协会将获得更充足的经费支撑，可用于球场修缮新建、青少年球员培养、教练员专业培训等领域。

然而，方案正式公布后，国际足联等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猛烈的反对和批评。

欧足联最先站出来明确表态：只要该股权出售计划不撤销，旗下成员将全面退出所有国际足联赛事。随后，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相继响应，陆续加入反对阵营。还有一些会员保持沉默，公开支持者寥寥。巨大压力下，国际足联撤回了融资计划。

从商业逻辑来看，反对者并非无的放矢。世界杯作为商业价值顶尖的全球体育赛事，拥有稳定且可观的长期收益。外部资本入股，看中的正是世界杯的商业现金流与收益红利。不过，资本逐利的本质注定了投资者会持续追求高额回报，这意味着，未来世界杯很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商业化扩容操作：赛事持续扩军，比赛场次增加、赛事票价上调、球员休整时间被进一步压缩等。无论哪一种，都将透支赛事口碑、加重球员负担。

如果只是担心世界杯被过度商业化，这场风波本应随着融资计划撤回而告一段落。国际足联撤回方案之后，针对因凡蒂诺的各类质疑却持续发酵，甚至蔓延到了对其个人品行的指控，要求其辞职的呼声愈发高涨。这足以说明，融资方案只是导火索，反对者的真正目的是借此机会改写世界足坛的利益格局。

国际足联实行“一国一票”的表决机制。德国、英格兰、西班牙等足球产业发达、市场体量庞大的欧洲足球强国，与人口稀少、足球市场薄弱的小型足协拥有完全同等的投票权。

因凡蒂诺之所以能稳固自身执政基础，核心依托就是中小足球协会的支持。毕竟，对于众多中小足球协会而言，国际足联的专项拨款才是其年度预算的主要来源。久而久之，国际足坛形成了一条微妙且稳固的利益链条：国际足联掌控大额资金，全球各国足协手握投票权，国际足联主席则对资金分配拥有主导影响力。

这套体系对各大洲足联，尤其是欧足联极为不利。欧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职业足球市场，为国际足球产业贡献了绝大部分收益，却无法获得与商业贡献度相匹配的话语权。更令欧足联不满的是，国际足联通过持续向中小足协输送发展资金，对中小足协施加影响，导致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内部的话语权不断被稀释、弱化。

近年来，国际足联不断扩大旗下赛事规模也是重要原因。世俱杯扩军，世界杯也在扩军，每一次赛事扩容，都意味着欧洲顶级球员要分散更多精力参加这些赛事。

此外，更多转播商和赞助商涌入国际足联赛事，挤压了原本属于欧足联和欧洲赛事的商业资源。因此，双方关于比赛日、球员资源、转播收入、赞助资金乃至全球足球注意力的分配权矛盾越来越突出。欧足联高喊“足球不能被出售”，并且对因凡蒂诺步步紧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国际足联内部权力重构，以此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

8月10日，欧足联联合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声明，再次严厉批评国际足联未经过充分多方协商，擅自推进重大商业提案的行为，并正式要求对本次世界杯股权融资风波，开展全面、独立的第三方专项审查。

短期内，反对者很难改变国际足联“一国一票”的基本治理结构。因此，把焦点对准决策程序，以此推动世界足坛治理改革是更加现实的路径。如果未来国际足联涉及重大赛事、商业开发和资本运作的方案，都需要经过更加充分的会员协会和各洲足联协商，接受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和监督，那么国际足联总部推动重大项目的自由度就会受到限制。

一笔没有做成的生意，把国际足坛长期积累的矛盾摆上了台面。融资计划可以撤回，但这场关于世界足球“谁说了算”的暗战，才刚刚开始。

本版编辑 韩叙至一伊美 编 吴迪

悦读

太空垃圾 谁来清扫

肖瀚

公路，所有人都在超速行驶”，而且更糟的是，这里“连一盏红绿灯都没有”。

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位学者的注意。两人均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一位是现任教授马修·魏因齐尔，另一位是前教学研究员布伦丹·罗索。他们尝试用“地球上的经济学”阐释太空经济发展的逻辑、探讨太空治理的可行性方案，于是便有了这本有趣的《新太空经济》。

和许多专业书籍一样，两位作者也高度认可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资本对于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对那些勇闯太空的私人企业给予了极高赞誉。但同时，他们也对诸如太空垃圾这种关注度不高但极其重要的议题付诸了大量笔墨。在他们看来，提前探讨这些问题非常必要：面对太空这个亟待开拓的新世界，人类应该吸取“地表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议题前置，减少矛盾、少走弯路，为太空经济发展乃至“宇宙移民时代到来”铺就相对平坦的道路。

不过，经济原理虽然相近，但实操起来却有很大不同。

英国学者加勒特·拉丁曾用故事描述了“公地悲剧”现象：假设一个村庄的草地是公共牧场，所有牧民均可免费放牧。为增加收益，每位牧民都会尽可能多养牛羊，因为多养一头牛羊带来的收益归自己，但草地退化的成本由所有人分摊。由于牧民们都选择过度放牧，最终，草地因超载而退化，所有牧民的牛羊都饿死了。这则故事想告诉人们的是，当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所有权时，每个个体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节制地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最终导致资源枯竭。

太空垃圾造成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低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

如果一直增加，迟早会因撞击等不可抗因素“被撕成数亿个高速飞行的碎片”，近地空间将从造福人类的希望之地，变为未来数十年甚至数代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地球上，解决公地悲剧大体有4种思路：其一是私有化，只要将草场分割成块，分给不同的牧民，每户就会自行核算牛羊数量与草原养护之间的最佳均衡点，由此，草场保住了，牛羊也保住了。其二是收税，保持草场公有这个基本前提不变，但对过度放牧的牧民收取更高的“草场使用税”，使其过度放牧的边际收益急速递减至零。只要没有了额外收益，牧民们自然就不会过度放牧了。其三是协商解决，先做一个整体损益曲线，大致算出草场的最大负荷，然后召集所有牧民一起商议各家的配额。其四是技术赋能，即通过更先进的草场养护技术加快草场修复速度，或者通过更高级的育种及饲养技术提高牛羊的产奶产肉率，用质量的提升替代规模的扩大。

不过，这一套“打法”要想直接平移到太空里，还是挺难的。

首先，私有化就行不通。根据联合国1967年生效的《外层空间条约》，任何国家均不能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法，将外层空间（包括月球）据为己有。

其次，收税也不行。收税的前提是存在管辖权，但没有哪个机构有资格代表全人类对造成太空垃圾的责任主体征收“垃圾处理费”。

再次，协商解决。这一条看起来最靠谱，但仅从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分歧就可以预判，达成这样的全球协议并非易事。

最后，技术赋能。在这一点上，人类还真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碎片追踪技术，自21世纪初以来，碎片追踪

技术已经迭代了好几次，可以帮助卫星更早变轨、降低蹭风险。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光靠“躲”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随着近地轨道道路上的“车流量越来越大、路况越来越复杂”，清除轨道上已有的碎片至关重要。但当前的“主动碎片清除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研发该项技术又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个成本该由谁来支付呢？

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持相对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只要给予机会，且背后的经济利益足够可观，私人部门是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尤其是在政府提供扶持的情况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持类似观点。奥斯特罗姆强烈赞同政府为相关初创公司提供支持，包括提供早期技术开发资金，或作为主要客户提出需求甚至直接提供订单。

目前，已经有多国政府和多个国际机构采取措施建立规范，包括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规。2023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对美国卫星电视服务提供商DISH开出了全球首张太空“乱扔垃圾”罚单，金额高达15万美元。这张罚单也向外界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监管机构已经开始严肃对待太空垃圾问题了。

对于太空垃圾的探讨仅仅是《新太空经济》的其中一个片段。在作者看来，新太空经济不仅是一场产业层面的革命，更拓展了人类文明的边界。对于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星辰大海，我们不仅需要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支撑，也需要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指引。



来稿邮箱 gjb@jirbs.cn

国际

当海风掠过卡拉尔

王植樱 廖思维

太平洋的海风掠过秘鲁苏佩河谷，卷起细沙。走进苏佩河谷，眺望远处，一座座土黄色的金字塔遗迹静静矗立。这里没有玛雅神庙精美，也没有马丘比丘壮阔，却孕育出美洲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文明——卡拉尔文明。

卡拉尔文明存续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相关考古资料显示，作为卡拉尔文明核心城市的卡拉尔-苏佩圣城遗址占地约68公顷，核心区分布着32座大型公共建筑及多处居住建筑群。

在卡拉尔遗址，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发现大规模战争和军事防御体系存在的明确证据，有的仅是层层叠叠的抗震公共建筑、下沉式圆形广场、祭祀空间，以及精心规划的聚落布局。这里呈现的不是冲突和对抗，而是一种共生共生的形态。

卡拉尔考古区考古遗址研究与保护副主任马尔科·马查夸伊告诉记者，长达31年的研究表明：卡拉尔文明是在和平与融合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马查夸伊举例说，由于苏佩河谷水源有限且呈季

节性变化，卡拉尔文明发展出了协调组织用水的机构，进行水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避免纷争。“通过合作和互助，当地人得以应对周期性的气候变化，使世代延续下来。”

此外，大型平台金字塔等公共工程、工农渔宗教角色各司其职、稳定的跨区域合作网络……这些无一不是卡拉尔文明社会组织高水平的体现。

阿斯佩罗是卡拉尔文明重要的渔业城市。在阿斯佩罗考古遗址，记者看到了来自今天厄瓜多尔海域的珍贵贝壳、来自亚马孙雨林的鸟类羽毛、来自卡拉尔-苏佩圣城遗址的棉花所编织的渔网。它们来自不同生态区域，这意味着数千年前的当地人已经建立起跨越海岸、河谷、高原甚至热带雨林的“交易网络”。

阿斯佩罗考古遗址田野负责人戴维·帕洛米诺向记者介绍，海边的居民提供鱼类和贝类，河谷居民则种植棉花和农作物。“不同地区的人们因地制宜发展生活，通过贸易和分工彼此连接。”

卡拉尔文明的合作形态，不只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希克拉”网袋。

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卡拉尔人利用当地植物纤维编织成“希克拉”网袋，装填石块，将其作为金字塔和平台建筑的填充层。当发生地震时，网袋中的石块相互缓冲、分散震动，从而提高建筑稳定性。

卡拉尔考古区考古学家乔纳森·多明格斯告诉记者，卡拉尔人借助材料特性适应自然力量，形成了顺应自然的建筑理念。这体现出卡拉尔人尊重自然规律、善于因地制宜的智慧，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

大约3800年前，由于强烈地震、河流改道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卡拉尔人的城市逐渐失去生存基础。曾经热闹的广场归于沉寂，金字塔被风沙掩埋，卡拉尔文明退出了历史舞台。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文明迭代演进，一代又一代人始终在相互合作、与自然相处中寻找发展的答案。数千年后，苏佩河谷的海风依旧，人们触摸着古老文明留下的印记。历史渐行渐远，而文明生生不息。（据新华社电）